

# 傅柯、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文化研究

姚人多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是一篇理論性的論文。作者試圖處理一個至今從未被處理的問題：傅柯本人對殖民主義的看法。自從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以來，把傅柯的理論用來解釋殖民主義已經變成一個學術圈內家喻戶曉的事，不過在學術界大談特談之際卻沒有人能告訴我們傅柯本人到底對殖民主義持什麼樣的看法。本文就是想填補這個在我看來是當今後殖民文化研究中令人尷尬的空白。本文的寫法是一一列出所有傅柯曾提及殖民主義與其相關字眼的場合，然後針對這些文本作分析。經過這些分析之後，本文企圖論證，有一些東西在阻止傅柯在殖民主義上發言：他把殖民主義談得越清楚，他的整套權力論證就越脆弱。

在論證完傅柯本人與殖民主義的關係之後，本文把焦點轉移到當今後殖民學者對他的詮釋及應用。作者選了牛津大學教授 Robert Young 作為主要的對話對象。我將論證，與絕大多數當今的後殖民文化研究者一樣，Young 只看到「論述的傅柯」，而忽略了其它面向的傅柯。這種單向的、片面的理解及運用傅柯的方式導致人們在一種抽離卻固定的狀態下談論殖民主義。最後，本文探討 Young 所提倡的「傅柯式的殖民論述」作結束。我質疑，Young 筆下的「傅柯式的殖民論述」是不是有更好的東西加以取代。

關鍵詞：傅柯、殖民主義、Robert Young、論述、治理性

## Foucault,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Cultural Study

Jen-To Yao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author addresses a theoretical question that has never been adequately answered in either the West or Taiwan: What were Michel Foucault's own views on colonialism?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in 1978, the application of Foucault's theory to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ssues has become commonplace. I believe the application has one embarrassing aspect: whereas Foucault's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few can clearly document his personal views on colonialism. I analyze 27 mentions of colonialism in Foucault's writings to clarify his own thoughts on the topic, then further examine colonial discourse by bringing Robert Young's works into the discussion. I argue that too much attention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has been given to "discourse Foucault" at the expense of "discipline Foucault", "racism Foucault" and "governmentality Foucault."

*Keywords: Foucault, colonialism, Robert Young, discourse, governmentality.*

## 一、沈默的傅柯、傅柯的沈默

1960年9月一群法國著名的知識份子簽署了一份宣言，公開為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權利辯護。傅柯一輩子最想超越的對象，沙特的大名也在連署書上面。當時法國政府把這份連署書視為叛國行為，下令調查。在一片官方的威脅聲浪下，沙特站出來向世人宣告，他不僅僅支持阿爾及利亞人的權利，同時也支持全世界反殖民主義運動。<sup>1</sup>沙特的登高一呼造就了他在國際間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James Miller 這位曾經為傅柯寫過傳記的作者表示，當時傅柯也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不過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這份連署書上面，因為傅柯當時「還沒沒無聞，所以也從未有人找他在宣言上簽名」(Miller 1993: 136)。

傅柯對殖民主義的沈默乃是本論文的重要關懷之一。上述的故事點出了一些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蛛絲馬跡。如果我們採信 Miller 的說法，1960年傅柯未對殖民主義表明立場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人找他簽名」，那麼，傅柯在七〇年代聲名大噪之後的沈默就格外地令人不解。在傅柯 30 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除了突尼西亞的政治運動、伊朗的革命與日本的禪學曾短暫地吸引他的目光之外，總體而言，他對歐美之外的歷史與社會，以及，更重要的，對歐美國家向世界其它地區的所作所為，的確不是很有興趣。David Macey 提到，1966 到 1968 年突尼西亞的經驗把傅柯帶進了政治的論爭領域(Macey 1993: 204)，從那個時候起，傅柯一反他之前在政治上的沈默，開始積極投入某些特定的議題，發表己見，甚至直接參與鬥爭。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殖民主義始終不在他的關心焦點之內。針對傅柯的沈默，Ann Laura Stoler 曾經這麼說：「殖民主義明顯地不在傅柯的關懷及分析架構之

1 沙特在幫法農(Frantz Fanon)的名著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所寫的序中曾這樣寫到：「魔術師及拜物教的日子會過去，你終將戰鬥，不然你便在集中營裡腐爛。這是辯證的結束，你譴責這場戰爭但不敢表明自己是與那些阿爾及利亞戰士站在同一邊....」(Fanon 1965[1990]: 23)。

中，對他來說，殖民主義是歐洲內部永恆戰爭狀態的副產品」(Stoler 1995: 28)。薩伊德(Edward Said)也曾做以下的評論：「他的(傅柯)歐洲中心主義幾乎是全面成立的，彷彿歷史只發生在一群法國和德國思想家身上」(Said 1988: 9-10)。如果這些學者的說法是真的，那麼1960年9月那份傅柯缺席的連署書似乎弔詭地代表他一輩子對殖民主義的立場。<sup>2</sup>

然而，如果傅柯對殖民主義的沈默是奇怪的，那麼更奇怪的是，1970年代末期後殖民主義會從他的「沈默」拉出一條批判的主軸。自從1978年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問世之後，將傅柯的理論用來解釋殖民現象已經變成一件學術圈家喻戶曉的事，他在該書緒論中的一段文字如此有力地構成了這20多年來傅柯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連結：

在此，我覺得引用傅柯在《知識考古學》和《規訓與懲罰》的論述(discourse)概念將有助於認識東方主義。我認為若不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我們將無法理解那套超乎尋常的系統性學科領域(discipline)，藉著它歐洲文化得以在後啟蒙時代政治地、社會學式地、軍事地、意識形態地、科學地、以及想像地，來經營東方，甚至，製造東方。(Said 1978: 3)<sup>3</sup>

正是「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這一句話構成了20多年來歐美後殖民文化研究的主軸。關於薩伊德的這段話，對台灣的讀者以及對本文一個特別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台灣的中譯本在這段關鍵的文字翻譯上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中文版的《東方主義》第四頁，翻譯者把薩伊德上述這段話翻成：

2 事實上，我個人覺得，終其一生傅柯有許多機會讓他發表他對殖民主義的看法，其中一個最好的機會是1976年他在法蘭西學院的一系列有關戰爭、征服、種族主義的講座。Ann Laura Stoler 曾針對這一年的講座整理出傅柯對種族主義的看法。參見她的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chapter 3(1995)。

3 除非有特別指出，否則本文所有中文翻譯皆是作者自己所為，與坊間之中文版有所不同。

我認為若不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將無法使我們理解歐洲文化何以能在這後啟蒙時期，透過一系列的規訓(discipline)系統進行政治性的、社會學式地、軍事性地、意識型態性地、科學地、甚至想像地在管理東方，或甚至生產東方。<sup>4</sup>

我認為，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於譯者把 discipline 這個英文字翻成「規訓」。如果這種翻法是對的話，那麼整本《東方主義》將變得十分難解，讀者將尋找一些薩伊德根本沒有寫也不會寫到的東西：規訓系統在哪裡？或者，「規訓的傅柯」在哪裡？從什麼角度來看西方的殖民權力是一種規訓的權力？

不過，中文譯者的「指鹿為馬」對本文來說卻有一點「誤打誤撞」的味道。我接下來的論證將試圖說明一件我觀察到的現象：在現今的後殖民文化研究中，就是少了關於「規訓」的部分。自從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以來，我們有著太多「論述的傅柯」，而缺少「規訓的傅柯」。太多「論述傅柯」的結果之一便是，我們花了極大時間及氣力去處理「作為一個再現體系的殖民」(colonization as 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而忽略了那個「作為一個管理體系的殖民」(colonization as a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以下的篇幅將區分成二個部分。首先，我將處理傅柯本人對殖民主義的看法。這一個問題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也甚少有人進行系統性的探訪。<sup>5</sup> 正如我一開始強調的，傅柯從未對殖民主義及相關議題發表過任何有組織的文字或談話（更不用說什麼一致性的理論），所以要釐清他對殖民主義的想法我們勢必得另謀他法、旁敲側擊。本文所採

4 這段文字的英文原文是：'I have found it useful here to employ Michel Foucault's notion of discourse, as described by him in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i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o identify Orientalism. My contention is that without examining Orientalism as a discourse one cannot possibly understand the enormously systematic discipline by which European culture was able to manage — and even produce — the Orient politically, sociologically, militarily, ideologically, scientifically, and imaginatively during the post-Enlightenment period.' (Said 1978: 3)我將在稍後的篇幅裡回過頭來詳細說明此處的翻譯問題。

5 Young 是少數對這一個議題進行論述的學者。他也是本文第二部份主要的對話對象。

取的辦法即是針對傅柯的著作、演講及訪談做一個地毯性的搜尋，一一列出他所有論及殖民主義及相關的字眼的場合：殖民(colonize)、殖民化(colonization)、殖民的(colonial)、殖民主義(colonialism)、殖民地(colony)、被殖民者(the colonized)等等。然後，我會針對這些傅柯提及殖民主義的文字進行一個非常基本的「文本分析」，這種文本分析的目的不在於為傅柯整理出一個一致的理論，而在於試圖發現這些文字裡面是否「隱藏」著一些規則。讓我再強調一次，本文的目的及動機絕不在於為傅柯「真正」的殖民觀作蓋棺論定的結論，事實上，這種「真正的」結論是不可能達成的。我的目的非常單純而謙卑：將傅柯對殖民主義的言論蒐集整理，藉著這些整理，我試圖論證，在殖民主義的議題上，不是只有一個傅柯，而是有很多個不同的傅柯。此外，有兩點必須特別提出來說明。第一，這是一個嶄新的談論傅柯的方式，即使在西方學術圈我也沒有發現有人用這種方式來「了解」傅柯；第二，由於它是一個新的談法，我並不宣稱這份清單已經包括傅柯所有關於殖民主義的文字及談話，事實上，這種「非電腦」及「純手工」的搜尋勢必會有些遺珠之憾。那些筆者力有未逮之處就留給以後的研究再加補充。

在本文的第三部份，我將針對 Robert Young 在傅柯與殖民主義這個議題上的論證作我個人的觀察及批判。為什麼是 Young，而不是別人？這是因為 Young 是少數幾個曾經直接針對傅柯與殖民主義做過討論的學者。他寫過一篇論文，題目正是 'Foucault on Race and Colonialism'。作為一篇文獻評論，在本文中，我刻意選擇與 Young 同樣的題目，我將論證，同樣的題目其實內容可以更多元、豐富。我的作法是，我將針對他對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所做的批判提出簡短扼要的說明，同時我也將提到他對傅柯「論述」的概念所做的闡述。然後，我將指出，Young 看待傅柯與殖民主義的方式是單一的、片面的。透過以下第二部份的列舉，我希望讀者能看出來，事實上 Young 忽略了傅柯在殖民主義上所做的一些與「論述」無關的陳述，而這些被他忽略掉的傅柯可能隱藏著一些非常有開發價值的理論出路。

## 二、傅柯與殖民主義： 一個地毯式的搜尋

據我的統計，傅柯提到與殖民主義有關的字眼總共有 27 次。我現在便把它們一一列出。我的寫法是先把它們全部寫出來，然後再針對這 27 個文本一起作分析。當然，我絕不否認我這種擷取式的作法有點斷章取義，不過，我要再強調的是，這裡的目的不在於建構一個傅柯式的殖民理論，而在於從傅柯的用字中找出一些隱藏的規則。然後，（如果這些規則成立的話）我再往前推一步，看看這些被我找出來的語言上的規則，是否可以用來解釋一些更大的東西，比如說，傅柯本人在殖民主義上的沈默。

### (1)

有一個叫西方理性(Western ratio)的特定位置，它在西方社會的歷史中被建構起來，為它與其他社會可能有的關係中（甚至也包括了歷史上曾經出現的社會）提供了一個基礎。很明顯地，這並不表示殖民(colonizing)情境對民族學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催眠以及因著醫生魘魅特質所導致的病人之異化，這二者並不是精神分析的構成物，不過，正如同醫生的魘魅特質只能在一個冷靜的特殊暴力關係以及它所產生的轉化中部屬起來一樣，民族學也只能在歐洲思想在歷史上的統治，以及歐洲思想與其他文化面對面時所產生的關係中，才能找到適當的面向。(Foucault 1970[1994]: 377)

### (2)

一個非資本主義的文化現在只有可能在西方之外誕生了。在西方，我們的知識，我們的文化已經被資本主義的鐵腕給扭曲。無疑地，我們太累了，以致於無法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的

文化催生。非資本主義的文化將是非西方的，它也將勢必仰賴非西方人去發明它。我之前想要說的是，目前西方人仍受制於當年自身的殖民(colonization)、受制於整個世界的西化。西方之外的世界是用著西方的工具來擺脫西方對它們的控制。現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非西方文化已經打開了。（引自 Kurasawa 1999: 150）

(3)

這些規範化技術以及與它相聯繫的規範化權力，不僅僅是醫學知識和司法權力相遇、結合、一個與另一個接通產生的效果，而實際上，通過整個現代社會，這是某種類型的權力（既不是醫學的，也不是司法的，而是另外的），它最終對醫學知識和司法權力進行殖民與壓制。<sup>6</sup>

(4)

我想試圖向你們指出這個（不正常）領域是從三個要素出發建構起來的。這三個要素（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手淫的人）從 18 世紀開始被分離出來，被界定，它們在 19 世紀鉸接起來，引入了不正常這個領域，後者漸漸地將它們覆蓋、據為己有，可以說對它們進行殖民，直至把它們吸收。（參見錢翰譯 2003: 58）

(5)

在成為關於行為科學和結構的幼稚性的科學之同時，精神病學就可以稱為關於正常與不正常行為的科學。……你們知道，在這個範圍內，為什麼及如何精神病學會如此不屈不撓

---

6 參見錢翰譯《不正常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25。由於我尚未有機會閱讀這一年講座法文或英文本，故本文中所有《不正常的人》的翻譯乃節錄自坊間的中譯本。

地把鼻子伸向兒童室和童年生活。這不是因為它想在它的已經很龐大的領域上增加一個附屬的零件；這不是因為它還想對一個過去沒有觸及的生活的一個小小的部分進行殖民(colonization)；相反，這是因為對它來說，在那裡，有它可能進行普遍化的工具。(參見錢翰譯 2003: 347)

## (6)

如果說靈魂是一個錯覺或一個意識形態的效果，那就錯了。恰恰相反，靈魂存在，它有一個實體。藉著一種權力的運作，它永恆不斷地在人身上及內部中製造出來，在被懲罰者身上，或者，更整體地說，在那些被監視、被訓練、被矯正的人、還有瘋人、家庭與學校中的小孩、被殖民者(the colonized)、以及那些卡在機器中一輩子要受人監督的人身上。(Foucault 1977: 29)

## (7)

然而，如果監獄在刑罰上的殖民化(colonization)是令人驚異的，那麼它不是因為，如人們可能設想的，監禁早已經在刑罰體系中安穩地建立下來，……事實上，許多國家與法國一樣，監禁在整個刑罰體系中只佔十分有限、十分邊陲的位置。(Foucault 1977: 117)

## (8)

為了要控制人，一個對細節的精巧觀察，以及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度在古典主義時期出現了，伴隨著它們有著一整套的技巧、方法、知識、描述、計畫、與資料。無疑地，從這些瑣碎的事情中，現代人文主義的人誕生了。我將從軍隊、醫療、教育與工業機構尋找例子。其他的例子也可以在殖民(colonization)、奴隸、與小孩的撫育中找得到。(Foucault

1977: 141, 314) (底線的部分乃是傅柯為內文所給的註腳)

(9)

黑格爾的辯證法以及一切追隨者都應當被理解為（這正是我要給你們指出的）哲學和法律對作為社會戰爭話語的紀錄、宣告和活動的歷史-政治話語進行的殖民和專制的和平化。辯證法對這種歷史-政治話語進行了殖民，後者在歐洲幾個世紀中，有時在閃光中，經常在陰暗裡，有時在博學中，有時在血泊裡，走過了它的道路。（參見錢翰譯 2003: 52）

(10)

這個（種族或種族戰爭的）理論一度非常含糊不清，有點類似在 17 世紀，一方面與歐洲的民族性運動和民族反對國家機構的鬥爭相聯繫（主要是奧地利和俄國）；另一方面，它也與歐洲的殖民政策相聯繫。這就是種族鬥爭和永恆鬥爭理論的第一個變形（生物學的）。（參見錢翰譯 2003: 53）

(11)

種族主義話語畢竟僅僅只是 19 世紀時種族戰爭話語的一個插曲階段、回潮和復現，是這個當時有百年歷史的古老話語的回潮。主要是為了達到社會保守主義的目的，至少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殖民統治，它採用了社會生物學術語。（參見錢翰譯 2003: 9）

(12)

我要強調種族鬥爭話語這個事實，認為它完全屬於被壓迫者的觀點是錯誤的。當然至少在源頭上，它主要是受奴役者的話語、人民的話語、人民請願和講述的歷史。……在不同的形式之下，它實際上服務於 17 世紀英國革命時期的激進思

想，但數年之後，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它又服務於法國貴族對路易十四權力的反擊。19世紀初，它又斷然地與後革命計畫相聯繫，最終寫出以人民作為真實主體的歷史。但是，幾年後，它又用來貶低被殖民的底層民族，因此說，這個話語是易變的，多功能的。（參見錢翰譯 2003: 69）

## (13)

征服和統治的至高無上，你們會看到它在我使用的「國王話語」這個詞中表現出來。……我認為第一次提出它的是布萊克伍德(Blackwood)在 1581 年寫就的一篇其內容很奇怪的名為〈為諸王辯護〉(Apologia pro regibus)的文章，他說：「實際上我們理解諾曼征服時期英國的情況應當和我們現在理解在強者面前美洲的情況一樣，他們那時還沒有被稱作殖民者。……諾曼人在英國的權利和我們在美洲的權利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殖民的權利。」（參見錢翰譯 2003: 91）

## (14)

我認為，在十六世紀末，人們可以觀察到在西方的法律政治結構有著一個返歸效應(return effect)，它是一個殖民(colonial)實踐的返歸。我們不應該忘記，殖民(colonization)伴隨著它的技術、法律與政治的武器將歐洲的模式轉渡到其它大陸，然而，這個殖民(colonization)對西方的權力機制、機構組織、與權力技術來說有一個返歸效應。一整套的殖民(colonial)模式被人（從殖民地）帶回西方，這些模式使得西方得以在殖民(colonization)中往來交通，一個內在的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Stoler 1995: 75)<sup>7</sup>

7 傅柯的這一段話是緊跟在上面第十二段引文之後出現。我們看到傅柯從「殖民的權利」一下子跳到「返歸效應」與「內在殖民主義」。這中間的轉折，筆者幾經思量仍是不得其解。此段引文的中文乃是筆者根據 Stoler 的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第 75 頁的英文翻譯而成，與坊間中文本有所不同，特此說明。

(15)

我認為在 18 世紀，歷史話語，主要是它並且幾乎僅僅是它，把戰爭當作差不多是政治關係唯一的基本分析器。……那麼，我現在想向你們指出，以一種有些矛盾的方式，從大革命開始，在 18 世紀甚至組成了歷史可理解性的戰爭這個要素，將怎樣即使沒有被歷史話語抹煞，也至少被縮減、被限制、被殖民、被植入其它內容、被分散、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是被教化了。（參見錢翰譯 2003: 205）

(16)

基本上，廣義的演化主義（不是達爾文的理論本身而是那個觀念的整體）在十九世紀已經不只變成是一種用生物學的語言來謄寫政治論述的方法，……一種用科學外衣來覆蓋政治論述的方法，同時還是一種思考殖民(colonization)關係、戰爭必然性、犯罪、瘋狂與精神疾病等等現象的方法。<sup>8</sup>……種族主義首先隨著殖民一起發展，也就是說隨著殖民者的種族滅絕（計畫？）一起發展。當必須殺人、殺死所有居民、殺死所有文明的時候，如果人們按照生命權力的模式運轉，怎樣才能這麼做呢？通過進化論的主題，通過種族主義（參見錢翰譯 2003: 241）。

(17)

有一些過程（它們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代表）把我們帶到了當前人們對啟蒙運動時期所提出之問題的偏執眷戀。第一個是科學及技術理性在發展生產力及政治決策過程的重要性；第二個是關於那個畢其功於一役的「革命」之歷史……；最

---

8 以上文字譯自 Stoler 的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第 85 頁的英文。與坊間中文本有所不同，特此說明。

後，第三個是在殖民年代(colonial era)告終時，那個引導西方問自己，究竟是什麼東西讓自己有資格去宣稱自身的文化、科學、社會組織、以及理性有著普遍效度的運動：難道這不是一個隨著經濟宰制及政治霸權而來的海市蜃樓嗎？兩個世紀以後，啟蒙運動回來了。不是以一種認知的方式回來，它不是要讓西方可以認識當前的可能性及自由。啟蒙運動是以一種質問的方式回來，它質問西方的極限，西方所濫用的權力。理性作為一個專制的啟蒙運動。(Foucault [1978] 1980a: 54)

(18)

如何治理自己，如何被治理，如何治理別人，如何接受治理我們的人，如何變成最好的治理者等等。我想，這些問題乃是十六世紀的特色，它們是位於兩個過程的交接點：第一、那個動搖了封建主義結構，即將形成巨大的領土、行政、與殖民國家(colonial state)的過程；以及，第二、它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前者的運動，打從宗教改革與反宗教改革開始，這個運動質問那個為了獲得永恆的救贖，人們在精神上受統治，以及在現世生活中被引導的方法。(Foucault 1979a: 5-6)

(19)

這三個（把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區分開來的）方法是軍隊、殖民(colonization)、與監獄。……布爾喬亞試著在軍隊及無產階級間維持一種敵對的關係，雖然有的時候會因為軍人拒絕移動或射殺而失敗，不過它們的嘗試常常行得通。殖民(colonization)是另外一種方法，那些被送到殖民地(colonies)的人並不總是維持無產階級的身份地位。他們被用來當作中間幹部或行政管理人員，當作監視、控制殖民地人民(the colonized people)的工具。(Foucault 1980b: 17)

(20)

在未來幾年之內我想研究一個主題：軍隊作為組織與知識的策源地；我將需要研究要塞的歷史，軍事計畫、運動、殖民地(colony)、與領土。的確，地理學必須是我整個關懷的核心。(Foucault 1980b: 77)

(21)

這些系譜學的片段一旦被發現之後，這些人們試著去挖掘的特定知識元素一旦被認定及循環流通之後，它們難道不會冒著被重新編碼、被重新殖民(re-colonization)的危險嗎？事實上，在一開始，這些統一的論述曾排除它們、忽略它們，不過看起來這些統一的論述現在已充分準備好要併吞它們，把它們拿回來並納進自己的論述當中，……直到目前為止，人們對此的回答往往是：「嗯，我們就繼續下去，一步一步累積，畢竟，那個殖民(colonization)的危險時刻還沒有到來」。人們甚至可能會試著去挑戰：「來，就試著來殖民(colonize)我們看看！」(Foucault 1980b: 86)<sup>9</sup>

(22)

實際的情況是，從某一個特殊的時間點開始（原因我們還有待研究），把瘋人排除在外的機制與監督兒童性慾的機制，展現了它們在政治上的有用性以及在經濟上是有利可圖的，於是，作為一個自然的結果，突然間它們被一些總體的機制與整個國家體系給殖民(colonized)及保存下來了。(Foucault 1980b: 101)

---

9 *Power/Knowledge* 這本書中的 Two Lectures 乃是 1999 年出版的中文版《必須保衛社會》中的第一及第二場。本篇文章中所採用的乃是 *Power/Knowledge* 的頁碼。

(23)

我相信，在我們的時代中，權力是同時經由權利及這些技術來運作的；我也相信這些技術與規訓所引發的論述入侵了權利的領域，以致於規範化的程序變得比任何時代都更持續性地與法律的殖民(colonization)糾結在一起。(Foucault 1980b: 107)

(24)

革命的年代已經到來。這個體認已經盤據在歷史上空有兩個世紀，它組織我們對時間的知覺，兩極化我們的希望。……有些人會說革命已經被政治實體給殖民了(colonized)，其他人會說理性歷史的面向為革命開啟了契機。我則比較喜歡用霍克海默(Horkheimer)所提的問題來了解革命，這個問題有點天真又有點狂熱：「那麼，革命當真如此可欲嗎？」(Foucault [1979]1981: 6)

(25)

社會科學的出現不能與新的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之興起分開。每一個人都知道民族學是興起於殖民(colonization)的過程（但這並不表示說它是一個帝國主義的科學）。同樣地，我認為如果人（如果我們這些活著、說話、工作的存在）變成許多不同科學的客體，那麼它的原因不是從意識形態中去尋找，而是必須從我們社會裡所形成的政治技藝裡頭去尋找。(Foucault 1988a: 162)

(26)

這就是我在突尼西亞所看到的。由於資本主義、殖民主義(colonialism)、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這些特定情況所產生出來的讓人無法容忍的本質，鬥爭的必然性便顯得不證

自明了。在這一類型的鬥爭中，直接的、存在的、或者我應該這麼說，肉體的承諾與實踐，便立即被包含在內。(Foucault 1991: 137)

(27)

我想要說的是，以下的事絕對是真的：在歷史上，權力的技藝可以從一個領域移轉到另一個。它們的歷史是相對自主於經濟的過程。想想那些在拉丁美洲奴隸殖民地(colonies)所使用的技術，它們可能會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或英格蘭再度被人發現。因此，相對的（不是完全的）自主性絕對存在。不過，我從來不認為單一的權力機制便足以描述、刻畫整個社會。(Foucault 1991: 170)

以上便是我所知道的傅柯所有與殖民主義有關的文字和發言。現在的任務是：我要如何在這 27 個有關殖民主義的片段文本中為傅柯找出一些有意義的共同點呢？或者，用傅柯在《知識考古學》的語言來說，這 27 個「陳述」(statements)中間有沒有論述的規則(discursive regularity)？爲了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讓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分類工作。第一個要做的工作是把直接指涉的場合與比喻的場合區分開來（如表一）。

我們先從比喻的場合開始說起。我認爲這些「比喻」的場合，在某種程度來說，可能較能彰顯傅柯本人對「殖民」的看法。這種場合總共有十個，也就是上面我摘錄的 27 個文本裡的第(3)、(4)、(5)、(7)、(9)、(15)、(21)、(22)、(23)、(24)。在這些場合中，傅柯口中或筆下的殖民化(colonization)與殖民(colonize)其實並不涉及實際的領土或人民之統治，他用這些字眼來比喻其他不是「殖民」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不是「殖民」的東西相當多樣，包括醫學知識、司法權力、不正常的領域、精神病學、監獄、黑格爾的辯證法、歷史論述、系譜學的片段、監督兒童性慾的機制、革命等等。這麼多不同的

表一 傅柯與殖民主義

	直接指涉殖民與殖民主義	用殖民等相關字眼來比喻
(1)	✓	
(2)	✓	
(3)		
(4)		
(5)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東西都會被傅柯用「殖民」等相關字眼來形容，這中間有什麼邏輯可尋呢？有的。在這十個場合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歸納出一個共同的規則：「殖民」這個字是被傅柯拿來比喻某甲對某乙的入侵、佔領、控制、覆蓋。比如說，上面第(20)段文字裡，傅柯說「來，就試著來殖民(colonize)我們看看！」。請注意這段文字中傅柯使用「來殖民我們看看」這幾個字的上下文脈絡：出現在「殖民」之前的動詞有「排除」、「忽略」、「併吞」等，也就是說，「殖民」這個舉動如果不

是與上述動詞劃上等號，至少在屬性上二者是不衝突的。再者，眾所皆知的，「排除」、「忽略」、「併吞」這些字眼在傅柯的權力認知中，是屬於負面性質，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殖民」這個字（尤其是當動詞時）對傅柯來說是屬於負面的權力，它與征服(conquer)、入侵(invade)、佔領(occupy)、宰制(dominate)、壓制(oppress)等字交互運用而不失原意。最明顯的例子當屬第(3)段文字，傅柯把「殖民」與「壓制」直接連接在一起。好，如果這個推論成立的話，那麼一個只屬於傅柯才有的問題便來了。我們來看看他在《規訓與懲罰》中的一段話：

十七、十八世紀以來的政治學理論一直把個體看成是構成某種社會契約的元素（獨立的權利法人），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在同一時期有一種規訓的權力也正在運作。這種權力把個體建構成權力及知識的客體。個體或許是契約論等的意識形態所虛構出來的原子，不過，個體同時也是規訓這種特殊權力所製作的一個實體(reality)。是故，我們實在不應該再從消極、負面的角度來談權力的效果：它「排斥」、「壓制」、「審查」、「分離」、「掩飾」、「隱瞞」。事實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它生產對象（客體）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以及從個人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於這種生產。（Foucault 1977: 194）

上面這段話代表著傅柯對權力的想像。或者，說得更嚴謹一點，它代表著傅柯對「生命權力」或「規訓權力」的想像：我們實在不應該再從消極、負面的角度來談權力的效果。在很多場合傅柯都曾表示，他對那種禁止、暴力、鎮壓、強制、壓抑的權力方式沒有興趣，對他而言，它們「不是權力的實質形式，它們只是權力的極限，是權力之一種沮喪、極端的形式」（Foucault 1988b: 118）。傅柯在1980年以後逐漸喜歡把權力及權力關係描述成行動的可能性，如果行動所產生

的結果總是確定不變的，那麼這些東西就不再是權力關係（姚人多 2002: 81）。或者，用傅柯自己的話來說：「當穩定的機制取代了敵對作用的任意揮發，對抗的關係便結束了」（Foucault 1982: 224）。當對抗的關係結束時，傅柯的興趣也就結束了。儘管他不否認在社會上會出現某一團體在一對一的狀況下取得完全的勝利，但在他所有的歷史研究中，我們很難發現他對這些狀態的描述（姚人多 2002: 82）。現在的問題在於：從傅柯對「殖民」這個字的用法，我們是不是可以推論，殖民這個動作，或是這種統治方式，與他所謂的生命權力及生產的權力形式無關？而且，會不會正是因為傅柯認為殖民是一種負面的權力形式，所以終其一生他對此議題始終興趣缺缺？也許。不過，我們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上述 27 段文字中傅柯直接指涉殖民主義的場合。這類的場合有 17 個：(1)、(2)、(6)、(8)、(10)、(11)、(12)、(13)、(14)、(16)、(17)、(18)、(19)、(20)、(25)、(26)、(27)。在這些場合中，當傅柯講到「殖民」時他所指的東西就是一般人觀念裡所了解的殖民：一個自認為文明、優越的民族對另一民族之土地、人民、與文化的統治及宰制。我們可以針對這 17 個場合中「殖民」這個字眼所出現的脈絡再區分成四大類（如表二）。這個分類的意義不在於找出哪一個才是傅柯心目中「真正」的殖民主義，也不在於為傅柯本人對殖民主義的看法作結論，而在於點出：關於殖民主義，一般後殖民文化研究中常見的「論述的傅柯」其實並不是唯一或全部，事實上，還有「規訓的傅柯」、「種族主義的傅柯」、「統治技藝的傅柯」等等，只不過這些傅柯至今仍未被後殖民文化研究者注意與評估而已。

### （一）殖民情境與特定知識體系、再現體系的關係

這一類的場合有四個，分別是(1)、(2)、(17)、(20)。在這些文字中，傅柯把殖民當成是一種知識或論述發生、發展的物質情境。眼尖的讀者不難發現，這一部分的傅柯乃是後殖民研究者的「最愛」。有

表二 直接指涉殖民主義的分類表

	殖民情境與 特定知識體系、 再現體系的關係	殖民情境與其它規訓 權力存在的情境或其 它規訓權力之承受者 並列在一起	殖民與種族 主義的關係	殖民情境裡頭 的統治技藝
(1)	✓			
(2)	✓			
(6)		✓		
(8)		✓		
(10)			✓	
(11)			✓	
(12)			✓	
(13)				✓
(14)				✓
(16)			✓	
(17)	✓			
(18)				✓
(19)				✓
(20)	✓			
(25)				✓
(26)				✓
(27)				✓

兩個場合傅柯提到民族學(ethnology)的誕生是與殖民活動有很大的關係。傅柯這裡的談法為殖民主義與再現體系二者間的連結提供了理論的基礎。不過，有一點是當今討論殖民論述的理論工作者往往忽略的：在這些場合中，傅柯的論點並沒有停在殖民主義上頭，事實上他用殖民主義來描述一些更大、更普遍的東西，如他所說：「如果人（如果我們這些活著、說話、工作的存在）變成許多不同科學的客體，那麼它的原因不是從意識形態中去尋找，而是必須從我們社會裡所形成的政治技藝裡去尋找。」其實，不只民族學與殖民主義有關係，有學者指出，人口普查也是起源於殖民情境（Hacking 1990: 17）。必須強調的是，Ian Hacking的論點傅柯並沒有談到，事實上，即使是民族學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傅柯也是象徵性地點到為止。總體而言，終其一生傅柯並沒有如他在'Question on Geography'這篇訪問稿裡

頭所承諾的，研究要塞的歷史、軍事計畫及殖民地。也就是說，傅柯對殖民情境的知識狀況並沒有作詳細的探討。

我個人認為，在上述四個例子中，第(2)及第(17)段文字可以連在一起看。在第(2)段文字中，傅柯提到，歐洲過去對世界其它地區的殖民現在變成一種牽制西方創造自身的力量。這一點在第(17)段文字中看得更清楚。就是在這裡，我們很難得的找到了傅柯對「後殖民狀況」所作的一些較為具體的敘述。照傅柯的說法，必須經歷「後」殖民文化及精神解構、建構的不只是那些曾經被殖民的民族及人民。以往那些高高在上的殖民者，同樣會受制於一些殖民時期的文化產物，比如說：權力的濫用。這種權力的濫用讓西方在政治經濟宰制的情況下，出現了一個海市蜃樓的錯覺：西方的文化、科學、及理性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價值。傅柯認為，現在的歐洲正受困於這種海市蜃樓，整個文化或自我認同面對著一種僵局。對本文的主題來說，我必須特別強調，西方人的對自身價值觀的普遍性錯覺並不是憑空而來，它需要一套知識與再現系統來建構，在這個面向上，後殖民文化研究者如薩伊德、Homi Bhabha等人對揭露這套論述系統有著實質的貢獻。

## （二）殖民情境與其它規訓權力存在的情境或其它規訓權力之承受者並列在一起：

這一類的場合雖然只有兩個：(6)、(8)，不過，對殖民主義的研究來說，它們所蘊藏的爆炸力卻是十分可觀。在這些場合中，傅柯把被殖民者與下列這些人並列在一起：犯人、瘋人、小孩、及工人等。這些人之間有什麼共同性呢？答案是，從這些人身上我們都可以觀察到規訓權力運作的痕跡。所以，當傅柯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要分析那些「對細節的精巧觀察，以及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度」，還有那些伴隨著它們出現的「一整套的技巧、方法、知識、描述、計畫與資料」時，他可以從軍隊、醫院、學校與工廠中找到佐證，也可以從殖民情境裡找到他要的證據。

也許是因為它只是個小註腳，所以這段出現在 *Discipline and Pun-*

ish 第 314 頁的文字到目前為止從沒有吸引任何（後）殖民主義研究者的注意。然而，在我看來，這段小註腳代表著殖民主義中的「規訓的傅柯」。長久以來，大多數的（後）殖民主義研究一直陷在 Albert Memmi 設下的泥沼中，無法脫身：「殖民主義使得被殖民者衰弱」(colonization weakens the colonized) (Memmi [1965] 1990: 181)，而藉著「規訓的傅柯」之啟發，人們不僅可以從這個泥沼中脫身，還可以修正長久以來對殖民權力或殖民國家機器的刻板印象：殖民主義中的權力也許不只是壓制的、暴力的、負面的，它可以／能是生產的與精細的。而且，如果殖民權力是規訓的，那麼這種權力將不是被國家機器所佔有，而如果殖民權力不在國家機器之中，那麼我們也許應該修正過去我們談論殖民政權的方法：不要再花這麼多的力氣去研究歷屆殖民總督們的所作所為，<sup>10</sup> 而應該多來研究一下那些分散在社會各處，對被殖民者的行為有著實質影響力的權力機制。經由論證殖民權力中那些使人同時變得有用又馴服的機制，人們可以從中破解那個揮之不去的被殖民者形象：不單純是懶惰、病態、邪惡、落後、無法了解的「大地受難者」，<sup>11</sup> 而是規訓權力所產生的勤勞、健康、經過調查、可以詳加分類、解釋、調度的勞動大軍。當然，我的意思絕不是說殖民權力中沒有那些殘暴、鎮壓、血腥、壓制等負面的成分，我的用意只是在論證殖民權力有另外一個面向，或者，該這麼說，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另外一套殖民權力，它的目的不在使被殖民者衰弱，而是製造一群馴服又有用的殖民地人民。

在這裡，我必須特別澄清兩點。首先，是「規訓」的定義問題。台灣的學界基本上對「規訓」這兩個字採取的是一種比較寬鬆的定義：只要任何與權力、教化、道德搭得上線的東西在台灣全部被稱為規訓。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中譯本會把薩伊德 *Orientalism* 裡頭那段的話中的 *discipline* 翻成「規訓」的原因。我之前提過，這種翻法是非常

---

10 比如說，黃昭堂的《台灣總督府》就是這種「權力是集中在殖民總督之上」的書寫典範。

11 這個字是來自於 Fanon 的書名：*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值得商榷的，現在我便針對這一點作較詳細的說明。讓我從「規訓」這個字的定義開始。在*Discipline and Punish*這本書中，傅柯是這樣解釋「規訓」的：

規訓的歷史時刻就是人類身體藝術誕生的時刻，這種身體藝術不只導向技巧的增加，也不只導向臣服的強化，它還導向一種關係的建立，在這種關係中的機制本身會讓人類身體在變得更有用的時候也變得更加服從，同理，在變得更服從的時候也變得更加有用。……人類身體正進入一個權力的機制中，這種權力機制開發它、破壞它、並且將它重整。一個「政治解剖學」，一個「權力的機關」誕生了；它定義了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身體，不只是讓後者作人們想要他（她）作的事，同時人們還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甚至叫他（她）要遵照一定的技術、速度、與效率來加以操控。因此，規訓製造臣服與受過鍛鍊的身體：「柔順的身體」。  
(Foucault 1977: 138)

有了傅柯本人對「規訓」的定義後，我們再來檢驗一下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我認為，在整本《東方主義》中，薩伊德只強調必須把西方對東方的知識建構看成是一套論述，他並沒有用傅柯的「規訓」概念來解釋東方主義的意思。說得更具體一點，薩伊德（至少在《東方主義》中）為我們描述的西方殖民權力並不是傅柯所說的「規訓」權力。如果是規訓權力，那麼我要追問：在何種意義下東方主義的論述是作用在身體之上？在何種意義下，東方主義會製造服從又有用的柔順身體？在何種意義下，東方主義是一種「政治解剖學」？以及，最根本的，在《東方主義》中，那個馴服又有用的東方身體在哪裡？我必須強調一點，把薩伊德上述的文字翻成「規訓」事實上不僅僅誤解了傅柯，同時也誤解了薩伊德。這種不求甚解的「挪用」就像是長期以來我們把傅柯的思想簡化成「知識就是權力，權力就是知

識」一樣危險。在這裡，我主張一種更嚴格的「使用標準」來理解傅柯：並不是所有的傅柯式權力都叫「規訓」。在傅柯的用法裡，規訓指的是作用在身體之上，增加身體的服從性的同時也增加有用性的權力機制。這套權力機制所用的方法是層級觀察、隔離、調查、紀錄、切割、分類等等，而不是同質化、整體化、想像、扭曲、建構等。若是用這個嚴格的定義來檢視台灣中譯本的譯文，我認為，薩伊德的那段話中的 discipline 絕對不是《規訓與懲罰》中讓身體馴服又有用的權力機制，而是學科的訓練、紀律，以及學科訓練的建構、組織、規律以及想當然爾的權力、宰制關係，或者，可以這樣說，它是一個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但不是規訓。容我再強調一遍，誰都不會否認規訓是一種權力關係，但權力關係並不同於規訓。又，規訓的權力當然與知識有關，任何知識也都一定會有一套權力關係在運作，但這並不表示所有與知識有關的權力都叫規訓。所以，《東方主義》的論述中有沒有權力關係？答案：當然有，但那種權力關係不叫規訓。再來，這句話中的 discipline 是不是一個雙關語？<sup>12</sup> 答案：可能是，但，如我之前所說的，再怎麼雙關，也跟傅柯所說的「規訓」不能等而視之。<sup>13</sup>

第二、殖民權力的規訓性質並不是我個人的創見。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一些學者注意到這件事(Mitchell 1988; Chatterjee 1993; Stoler 1995; Rose 1999)。<sup>14</sup> 基於篇幅的限制，他／她們各自的研究成果我便不在這裡敘述。這裡我只想強調一點，殖民政府與規訓權力機制間有一種「選擇性親近」。對此，讓我們回到傅柯的文本裡來說明。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傅柯曾清楚地告訴我們，「規訓」這種新的

12 這是兩位匿名審查人其中一位的觀點，該位審查人堅持薩伊德此處的 discipline 是規訓，雖然我不同意他（她）的講法，不過在此特別提出致謝。

13 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證明薩伊德的'discipline'不是規訓。比如說，在英文中，我們常常會聽見年長者對行為不檢點的小孩說：'You need discipline'。如果薩伊德文中的 discipline 應該翻成規訓，那麼這裡的'you need discipline'難道得翻成：「（你）妳需要規訓」！？紀律與教化絕對不能等同於規訓。今天把所有大大小小的權力一股腦地都說成是規訓，對傅柯的研究來說絕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

14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學者在引用傅柯的概念時並沒有注意到我所說的那個註腳。也就是說，這些學者並沒有留意，其實傅柯本人也注意到殖民權力的規訓性質。

政治解剖學的發明及採用「幾乎沒有例外，全都是爲了應付一些特殊的需要：工業的革新、特定傳染病的重新爆發、來福槍的發明、或是普魯士軍隊的勝利等等」(Foucault 1977: 138)。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那麼，很明顯地，「殖民」這種統治異民族的政治事業絕對算得上是一種「特殊的需要」。想想看那些在殖民地地上看似無止盡的叛亂、抗爭，難道積極增加被殖民者的柔順性(docility)不在殖民政府的統治議程之上嗎？而且，光是增加被殖民者的政治柔順性對殖民權力來說仍是不夠的。Peter Duignan 與 Lewis Gann 曾言簡意賅地說出殖民主義的真諦：「所有殖民的最終目標都是在賺錢」(Duignan and Gann 1972: 44)。而，要賺錢則需要勞動力，但勞動力絕不會是天生的，用 Zygmunt Bauman 的術語來講，這需要一個「製造生產者」(Bauman 1998)的過程。如果上面的命題都成立的話，那麼，我們要問：到底有什麼東西或什麼技術一方面能增加被殖民者政治上的柔順性，另一方面又能增加其有用性(utility)呢？除了「規訓」，我們還有更好的答案嗎？

行文至此，規訓與殖民主義間的關係已經更加清楚了。我們可以把上面這一段文字視爲 *Discipline and Punish* 第 314 頁那個至今仍未受重視的註腳之補充說明。必須特別強調，傅柯在許多場合都曾把工廠、監獄、軍隊、精神病院、修道院、家庭這些規訓機構放在一起看。換句話說，工人、軍人、犯人、瘋人、窮人、及兒童這些規範化權力運行的對象們常常被傅柯並列在一起談論。<sup>15</sup> 不過，在這些大大小小並列的場合中，*Discipline and Punish* 的第 29 頁及 314 頁是很特別的，因爲只有在這裡，傅柯把「被殖民者」及「殖民」放進他所列的名單之中。爲什麼會這樣？很遺憾地，傅柯本人沒有跟我們說明原因，事實上，很有可能，他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待會談統治技藝的時候會回過來作補充說明。

---

15 最明顯的例子是他 1975 年用「不正常的人」這個概念所做的綜合說明。

### （三）殖民與種族主義的關係

這種場合有四個：(10)、(11)、(12)、(16)，它們全部出現在傅柯1976年的法蘭西學院講座中。我們之前提過，那一年的主題是「必須保衛社會」，他談的東西包括戰爭、征服以及種族主義。基於這些主題與殖民活動的關連性，我們可以判斷，1976年的1月7日到3月17日這段期間也許是傅柯一輩子最有可能清楚地陳述他對殖民主義的看法的歷史時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這11場講座中，傅柯多次在殖民主義這個議題的邊緣繞來繞去，卻始終沒有把它當成是主要探討的對象。原因是，傅柯感興趣的是「種族主義」(racism)，而不是殖民主義。而且，他在這幾場講座中所談的種族主義與今天人們所理解的反猶太人、歧視黑人或者「黃禍」之類的種族主義不太一樣，如他所說：

問題不是現在來建立傳統和一般意義上的種族主義的歷史。我不想建立在西方可以屬於某種種族的意識的歷史，也不想建立人們企圖用來從肉體上排除、貶低和摧毀一個種族的儀式和機制的歷史。我要提出的是另一個問題，與種族主義無關，最初與種族問題也無關。它試圖弄清楚，關於國家及其制度和權力機制的某種特定分析（批判的、歷史的和政治的）是怎樣出現的。這種分析術語是二元的，社會實體……是由兩個集團組成，不僅僅界限分明，而且針鋒相對。這兩個集團構成社會實體，形成國家，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實際上是戰爭，永恆的戰爭關係。（參見錢翰譯1999: 77-78）

簡言之，傅柯談的種族主義是一種歷史悠久二元對立的「戰爭狀態」，以及這些戰爭狀態的論述是如何形塑人們對權力的了解及批判。<sup>16</sup>對本文的目的而言，這裡的重點在於：種族主義在該年講座中

---

16 在這裡，不妨作一點補充說明。傅柯在這一年的講座中，試圖從戰爭及戰略的角度來

的絕大多數時刻中，傅柯所指的是（歐洲）社會「內部」的衝突，而不是「內部」與「外部」之分野，也不是「內部」與「外部」的鬥爭與對抗。換句話說，談到種族主義，傅柯的思路裡不是自我(self)與異己(other)的區別，更不是西方對東方的宰制，而是，可以說是，「自我」的定位（這個「自我」當然是歐洲）。

關於這一點，在3月10日的那場講座中，傅柯做出最清楚的說明：「一個民族控制的國家力量越多，它就越強大。這也意味著民族特性不是統治其它民族，而是其它：是自我行政，由自己管理、控制、保障國家形象和權力的建構和功能」（參見錢翰譯 1999: 212）。不過，特別強調的是，七天過後，也就是該年的最後一場講座，傅柯針對「種族主義」作了些補充及釐清。這些補充及釐清比較能貼近當今人們對種族主義的看法。必須說明的是，這裡的意思絕不是說傅柯修改了他原先的看法，而是，傅柯在這最後一場講座中強調一個看法：種族主義的面貌是會隨著它所運作的場域而變化。比如說，在十九世紀，它因著生命權力的興起而進入國家機制之中（在這之前，「它是在其它地方起作用」），從此便展開了傅柯所稱的「國家種族主義」時期。這種種族主義有著兩層意義，第一，它是一種對人口所進行的區分，經由這些區分人口於是形成若干集團，這些集團是不平等的，有的「高級」，有的「低級」，在最極端的時刻裡，「高級」與「低級」之間的區分就是生與死的區分，如傅柯所說：「最終在權力承擔生命責任的領域引入斷裂的手段，是應當活的人和應當死的人之間的斷裂」（參見錢翰譯 1999: 238）。其二，它是一種自我與異己的關係，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它是「高級」集團與「低級」集團間的一種「你死」／「我活」的正相關：「你讓更多的人死，你就越能活下去」。種族主義，用傅柯自己的話來說，「正好以一種全新的

---

進行他所傾心的權力分析。他對話的對象包括霍布斯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克勞賽維茲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以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等等。然而，傅柯這一年的嘗試是短命的。1977年傅柯休息一年，沒有在法蘭西學院作年度講座。1978年，休息一年之後的傅柯所講的主題已經不再是「戰爭」，而是「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事實上，從那個時候開始，傅柯就再也沒有回到「戰爭」的主題。

可以與生命權力的運作相容的方式使這個戰爭關係發揮作用——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須死掉」（參見錢翰譯 1999: 240）。簡言之，「該死」的人越多，「該活」的人就越純粹、健康。到這裡，種族主義已經與生命權力、現代國家、社會進化論，<sup>17</sup> 以及歐洲人「自我培育」（cultivation of the self）的技術及心態緊緊連在一起無法分割（或者應該這樣說，十九世紀以來的種族主義就是由這些東西所構成的）。

正是在這個脈絡之下，殖民主義進入了傅柯的視野。如同他在上述第(16)段文字中所說的：「種族主義首先隨著殖民一起發展」。按照傅柯的解釋，種族主義從十九世紀開始慢慢演變成一個合理化的藉口或機制，它讓那個強調生命價值的生命權力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把人處死：「在國家按照生命權力的模式運轉之後，國家殺人的職能就只能由種族主義來保證」（參見錢翰譯 1999: 241）。換句話說，隨著殖民一起發展是一整套「使人死」的事業。當然，傅柯這裡「使人死」指的不僅僅是直接殺人，它還包括增加死亡的風險、政治死亡、驅逐、拋棄等等（參見錢翰譯 1999: 241）。但，無論「使人死」的內涵是什麼，殖民始終為歐洲的種族純正與健康提供了一個最初的舞台，<sup>18</sup> 透過這個「你」死／「我」活的舞台，歐洲種族內部正在進行生命調節、延長壽命、規避風險，而殖民地上的人民卻面臨著屠殺甚至種族滅絕。

一如往常，不喜歡作道德評論的傅柯針對這個現象並沒有做出指控。即使殘酷有如納粹政權，傅柯對它的形容也只是「這是絕對種族主義的國家，嗜血的國家，自殺的國家」（參見錢翰譯 1999: 244）。我不想停留在這個點上指控傅柯，我想把討論的焦點帶回殖民主義上頭。眼尖的讀者馬上會發現，之前我們提到的殖民主義中的「規訓的傅柯」在這裡便消失了。在「種族主義的傅柯」中，生命權力只發生

---

17 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大量出現了人種的分類等級。比如說，從猿猴演變成歐洲白種男人的肖像圖，或者，把各種不同的人種畫成一棵「進化樹」，這些再現方式的最終目的都是在表達白種（男）人是位於整個人種（社會）進化的終點。參考 Ann McClintock (1995: 39-39)。

18 Stoler 在這一點上會加上歐洲布爾喬亞的自我技藝。

在歐洲種族內部，殖民主義是屬於「你死」的那一部份，也就是說，被殖民者是屬於「該死」的那一個集團，積極培養、調節、計算生命的權力不會發生在這群人身上，在這種情形之下，殖民主義又回到了上面我們談比喻的場合一樣，是一種負面的、排斥的、放逐的、甚至謀殺的權力。

關於這點矛盾，傅柯本人並沒有解釋。再強調一遍，傅柯處理的問題是種族主義，而不是殖民主義。前者可以單純只討論「自我的技藝」或「自我的照料」，而後者卻必須把對「異己」的所作所為納進討論。在這裡，有一個問題倒是不妨一問：傅柯對社會上的諸多「異己」都曾大書特書（例如，瘋人、犯人等），不過為什麼偏偏對被殖民者這個種族主義的「異己」卻總是避而不談？答案也許與我以下要討論的東西有關。

#### （四）殖民情境裡頭的統治技藝

這種場合有七個：第(13)、(14)、(18)、(19)、(25)、(26)、(27)，照出現的次數來看，這是最多的一個類別。在這些場合中傅柯把殖民當成是一種權力的技藝，同時，他也注意到這個權力技藝是可以從甲地移轉到乙地。我們這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時間上的先後次序：「想想那些在拉丁美洲奴隸殖民地所使用的技術，它們可能會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或英格蘭再度被人發現」。這種現象，傅柯在 1976 年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中把它稱之為「返歸效應」。什麼返歸？答案是，殖民實踐的返歸。那些用來管理殖民地的權力形式與統治技術從十六世紀末開始被人慢慢地「運回」西方社會。

那麼，我們繼續追問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技術到底是什麼呢？是規訓？還是關於調節人口的技藝？眾所皆知，傅柯曾在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troduction* 中大力論證，西方自十七世紀起沿著生命(life)發展出來的兩套權力技術：「人體的解剖政治學」以及「人口的生命政治學」(Foucault 1979b: 139)。不過，對本文的目的而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傅柯從來沒有把這兩套權力技藝的「誕生」與殖民主義連

在一起。甚至，不管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或是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從傅柯所用的語言來看，他一直強調這些權力技術的歐洲「本土性」。如果是這樣，有一個問題就必須被解決：既然不是這兩種權力技術，那麼從殖民地回歸到歐洲的權力技術究竟是什麼呢？

很遺憾地，傅柯也從未針對這個問題做出任何令人滿意的回答。這也許是任何想了解傅柯與殖民主義的學者一輩子都難以解開的謎團。不過，有些學者有他自己的答案。比如說，Timothy Mitchell 曾在 一本著作中表示：「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是一個殖民發明(colonial invention)。它的原則是在歐洲與鄂圖曼帝國的殖民邊境中設計發展出來的。絕大多數全景敞視建築的具體例證並不是蓋在歐洲，而是蓋在像殖民地印度這樣的地方」(Mitchell 1988: 35)。若規訓權力彰顯在全景敞視主義上頭（這是傅柯本人的說法），Mitchell 告訴我們，從殖民情境返歸歐洲的權力技術不是別的就是規訓。前面我們提到「殖民權力的規訓本質」，不過，在這裡 Mitchell 嘗試向我們證明的是「規訓權力的殖民本質」。這中間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如我們之前所說，是個「應付特殊需要」的問題，不過，後者除了保留前者的意義之外，它還涉及到一個「起源」(origin)的問題：規訓是來自於殖民情境。如果 Mitchell 的研究可信，那麼他所證明的不僅僅是傅柯的歐洲中心主義，他同時也說明了傅柯對殖民主義的無知。

行文至此，我們看到連全景敞視建築這麼一個最能代表傅柯心目中規訓是什麼的權力機制都是一種殖民產物，那麼，規訓與殖民這二者間的連結可能比目前人們所想像的都來得根深蒂固。當然，我們已經無從得知傅柯本人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也不能確定傅柯對邊沁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我們更不能證明傅柯是否刻意迴避規訓權力的殖民本質，好來彰顯歐洲社會的「內生性」。無論如何，從傅柯這些陳述中，我們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到，他似乎覺得殖民地中有些值得大書特書的統治方式與權力形式，只不過他始終不肯跟我們說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在這個意義之下，Stoler 抓住了這條傅柯留下來的線索。在她的著作中，她看到了管理殖民地的方式與當時歐洲布爾喬亞在國

內所發展出來的社會秩序有一定程度的關係(Stoler 1995)。我們可以同意 Stoler 的觀察，不過，在我們看來，統治公民與統治被殖民者這二者還是存在著許多重大的差別。也就是說，「殖民活動的返歸」一定不是照單全收，那套在殖民地地上運作的方式，就算是拿回來對付本國的窮人、犯人、瘋人等這些社會上的異己(other)時，勢必也要經過一番修正才能用在殖民母國。

以上便是我對傅柯所有有關殖民主義的發言及文字所做的分析。從中我們可以整理出以下五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五點填補了當今後殖民文化研究中一個令人尷尬的空白：每個後殖民的理論工作者都知道傅柯對他／她們的重要性，卻沒有人可以真正說出傅柯本人對殖民主義的看法及立場！？

- 一、在所有比喻的場合中，傅柯一概把殖民視為一種負面的權力形式。
- 二、殖民情境是某種特定知識的生成要件。
- 三、被殖民者與犯人、工人、瘋人、小孩有著同一類型的靈魂：被規訓的靈魂。
- 四、殖民活動是種族主義的最初舞台，它是進入生命權力掌控之後的歐洲國家發動戰爭的名義及戰場。
- 五、殖民地上的某些權力技藝會回歸到殖民母國。

在這裡，我必須特別強調兩點。第一，有些人可能會說，這個尷尬的空白不存在。持這種意見的人認為，我們就算不知道傅柯本人的看法，還是可以把他拿來在後殖民研究上大加應用。況且，關於傅柯與殖民主義的問題已經有相當高的共識，這個共識就是殖民主義在傅柯的著作當中，極少出現。換句話說，我們只要知道傅柯對殖民主義是沈默的就夠了，其它的不用再多說。<sup>19</sup> 然而，對我來說，接受共識不是本文的目的。甚至，正是因為我不願接受這種共識，才利用本文

---

19 這是本文評審之一的意見，雖然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但我非常感謝他（她）提出來，讓我意識到台灣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找出了二十七個出現「殖民」的場合。若是我們一開始就認定殖民主義在傅柯的學說中極少出現，並以此自滿，那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傅柯曾經在殖民主義上做出如此多樣性的宣稱。試問這對傅柯的研究來說，到底又有什麼幫助呢？

第二，請留意，我所說的是「填補」空白，但不是「填滿」空白。前者可以是一種永遠正在進行、永遠也不會完成的動作，而後者則是完成了，是加一個句點的。對傅柯與殖民主義的關係來說，我相信後者的可能性絕對不存在。本文的目的，正如我一開始就不斷強調的，是在拋磚引玉，我所找出的這二十七段文字以及這五點類似「結論」的歸納意見，絕不是要蓋棺論定式的斷言傅柯「真正」的看法。

說明完這兩點之後，讓我們回到上述五點來問一個問題：它們中間存有一定的規則嗎？我的看法很簡單：沒有。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比喻與直接指涉的兩個場合間，存有一個意義上的斷裂與矛盾：在語意上，殖民是一種負面的權力形式，不過，在實際上，它卻可能帶有規訓的「正面」色彩。換句話說，儘管傅柯語帶玄機地告訴我們，在殖民地或被殖民者身上可以找到規訓的權力，不過，這並沒有導致他在使用這些字彙時特別謹慎小心。從他的用字遣詞中，我們依然可以十分確定，他並沒有賦予「殖民」這個字獨特的意義（我們只需比較一下他對government這個字慎重其事的態度便可以看出這中間的差異）（見 Michel Foucault 1982）。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是直接談殖民主義的場合，傅柯也出現了嚴重的自我矛盾。比如說，我們之前提到的「規訓的傅柯」與「種族主義的傅柯」對被殖民者的看法上之歧異。我在其它場合曾表示，接受矛盾也許是閱讀傅柯必備的心理狀態（姚人多 2002），這一點在殖民主義上頭看來也是成立。

基於以上，我們於是可以為這一部分的討論作一個簡單的結論了。關於殖民主義，傅柯真的是那麼沈默嗎？對 Young 來說，答案是肯定的。他提出的解釋是，因為沙特是殖民議題的主要發言人，基於傅柯與沙特複雜曖昧的瑜亮情節，所以他不想淌這混水(Young 2001:

399)。對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來說，答案也是肯定的。她在一篇著名的論文'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提到的，傅柯的許多概念，比如說，空間的經營、行政的管理、對邊陲地帶的關懷，都有著帝國主義的影子，不過傅柯的談法卻阻斷了任何有關帝國主義的敘事結構。Spivak 把傅柯這種欲言又止的現象稱之為西方知識圈對「非西方」的歷史所集體進行的「允許的無知」(sanctioned ignorance)(Spivak 1988: 291)。在我看來，Spivak 的解釋比 Young 來得較為深入，儘管我不否認後者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來說是正確的。

從我上述的整體討論中，我希望已經達成一個目標：用「沈默」這個形容詞來形容傅柯對殖民主義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即便我們可以接受「沈默」這兩個字，但問題也應該繼續追問下去：除了沙特與「允許的無知」之外，難道就沒有其它原因「阻止」傅柯在殖民主義上發表看法嗎？我的看法是肯定的。之前我有提到，會不會正是因為傅柯認為殖民是一種負面的權力形式，所以終其一生他對此議題始終興趣缺缺？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答案：不是。根據其中一個傅柯的說法，在殖民地地上也可以找到規訓這種「正面」的權力運作。所以，答案在別處。我認為，從傅柯論及殖民地權力技藝的場合，似乎可以看出問題的端倪：傅柯相當程度地受限於他的「歐洲中心主義」，但這種歐洲中心主義可能不像薩伊德等人所講的是在他個人的認知層次，而是在他的理論層次。讓我們再舉 *Discipline and Punish* 為例來說明。讓我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在該書中，傅柯有可能宣稱規訓權力機制是來自於殖民活動嗎？<sup>20</sup> 我們認為不可能。因為，如果他極力論證的那個「新的權力機制」其實是一個「外來品」，這對整本書的論點是何等重大的打擊。終其一生，傅柯都試圖說服世人相信，從某個時間點開始，西方社會中權力類型有了深刻的變化，而重點在於，這個變化是歐洲內部的一些因素使然，它們可以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工

---

20 不要忘了，*Discipline and Punish* 是傅柯唯一把「被殖民者」與「殖民」納入他常列的名單（瘋人、犯人、兒童等等）的場合。很有可能他注意到邊沁的發明一開始是在殖民地中實現。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事實究竟如何，還需更多資料佐證。

業革命、或人口增長等等，反正都與「外來的」東西無關。這一點確定之後，於是我們知道，傅柯一輩子都不可能向我們交代清楚殖民主義的「返歸效應」是什麼，甚至，可以這樣說，殖民主義打從一開始就注定落在傅柯整個理論架構之外：他把殖民主義談得越清楚，他的整套權力論證就越脆弱。

### 三、殖民論述： Robert Young 對傅柯的詮釋

有了以上關於傅柯本人對殖民主義的探討之後，我們現在便可以來看看傅柯之後的學者對他的詮釋及應用。Young 無疑地是這方面著力最多的人之一。從 1990 年的 *White Mythologies*，到 1995 年的論文 'Foucault on Race and Colonialism'，到 2001 年剛出版的 *Postcolonialism*，這十多年來他一直對傅柯與殖民主義的關係有著長期的興趣。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有著長期的興趣並不代表他能推陳出新。我接下來將論證，這十多年來 Young 談傅柯的方式始終只有一個；儘管他對薩伊德有諸多批判，不過他的談法卻深受薩伊德《東方主義》的制約：把殖民主義當成是一種論述與再現。我認為，他之所以會對「殖民作為一種論述」有著如此大的執著，是由於他只看到了傅柯談殖民主義與再現體系的場合（也就是上述 27 個文本中的第一個），而忽略了傅柯其它關於殖民主義的文字與談話。由於篇幅的限制，容我只挑 'Foucault on Race and Colonialism' 以及他在 *Postcolonialism* 這本書中專門談傅柯的一章 'Foucault in Tunisia' 這兩篇文章來進行我的論證。

在 'Foucault on Race and Colonialism' 這篇文章中，Young 開頭第一句話便寫到：「對於權力，傅柯有許多話要說，不過，對於權力在種族及殖民主義場域裡運作的方法，他卻可疑地小心謹慎。他在這些議題上的沈默是令人吃驚的」(Young 1995: 57)。在點出了傅柯的沈默之後，他把焦點轉移到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他認為，《東方主義》這本書之所以會這麼有影響力是因為他運用了傅柯的論述概念(Young

1995: 57)。透過薩伊德的闡述，人們了解到，在西方被普遍認定是「真」的東方知識其實有可能是一種杜撰或意識形態上的想像。透過這個邏輯，Young 於是把關於西方世界對東方的論述形成（甚至整個殖民主義）帶進了對「異己的再現」之探討。這個關於如何再現異己的問題便是 Young 這十幾年下來為自己所設下的問題域(problematics)，他所有有關傅柯與殖民主義的論證皆是在這個問題域裡打轉。東方是一個異己，西方對這個異己的了解是一種論述建構，若是要破解這種建構，我們便要讓這個異己自己說話，自己發言。這便是 Young 對薩伊德這本影響世人的著作所做的結論。<sup>21</sup>

不過，很顯然地，Young 認為這種推論方式太過簡略。他在文章中指出，薩伊德只看到傅柯在 *The Order of Things* 裡對論述的說明，以致於他對「論述」這個概念的理解是片面的(Young 1995: 58)，他引用了傅柯在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裡頭的一段話來說明薩伊德的理解「錯誤」：

我們必須把論述看成是一系列不連貫的片段，它們的戰術功能既不是一致的也不是穩定的。我們不應該把論述的世界區分成被接受的論述與被排斥的論述；同樣地我們也不應該把論述的世界區分成宰制的論述與被宰制的論述。論述的世界是由許多多元的論述元素所組成，它們可以照著各式各樣的策略在運作。(Foucault 1978: 100)

簡單地說，在 Young 看來，薩伊德的錯誤在於他沒有看到傅柯後來對

21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所談的東西究竟是不是僅止於「論述」，關於這個問題學界頗有爭議。不容否認，《東方主義》是一本複雜的書，他裡頭的思想及學說無法用任何單一的文字規律來表示。不過，在本文中，我支持 Young 對薩伊德的詮釋，即《東方主義》的問題意識僅鎖定在「殖民主義作為一種再現與論述」的層面。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東方主義》中所描述的東西與傅柯的「規訓」或「治理性」的原意相差甚多。除非，我們採取一種比較寬鬆的立場，把所有有關權力／知識的東西都叫做「規訓」，把所有有關統治的東西都叫做「治理性」，否則我堅決主張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沒有「規訓」，也沒有「治理性」。不過，我們始終得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像這樣子寬鬆的「使用」及「詮釋」傅柯，難道是正確的嗎？

論述概念的補充及修正，以致於他用了一個硬性的二分法在談「論述」以及西方對東方的想像。Young 以一種遺憾的口吻寫到：「儘管傅柯（在論述這個概念上）做了實質的修正，不過，早期的二分法模式仍是繼續籠罩在殖民主義的分析中」（Young 1995: 59）。

以上便是 1995 年 Young 對傅柯與殖民主義的詮釋。很明顯地，正如我之前在導論中提到的，他只看到了「論述的傅柯」，而沒有看到「規訓的傅柯」、「種族主義的傅柯」或「統治技藝的傅柯」。2001 年，Young 出版了一本將近五百頁的新書 *Postcolonialism*，在這本書裡面，他開關了一個章節專門談傅柯與後殖民主義。與他 1995 年的那篇文章相比，六年之後的他仍然維持他一貫的「殖民主義作為一種論述」（不管殖民主義的前面有沒有加一個「後」）的談法。在理論的建構上來說，可以說是毫無新鮮感可言。除此之外，在引經據典的功夫上，Young 也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東西。六年前與六年後他所引用的傅柯與殖民主義的文句還是那一段出自於 *The Order of Things* 第 377 頁的那段話，彷彿傅柯不曾說過別的有關殖民主義的看法。然而，這是事實嗎？我們在第一部分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及精力不厭其煩地把傅柯有關殖民主義的文字與談話一一列出，難道不剛好證明了 Young 在這一點的偏頗嗎？在這裡，我不確定 Young 是否注意到傅柯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那段不甚引人注意的註腳，我也不確定他的寫法是否在告訴讀者「論述的傅柯」才是理解殖民主義的主流。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同的傅柯在六年後依然不見踪影。

也許有人會認為，就算這是事實，這頂多只能代表學科上的區隔，作為一個牛津大學的文學教授，Young 當然著重於殖民主義中論述的部分。我承認這種說法若是用在 Young 個人身上也許有幾分真實性（事實上，接下來我馬上會談到，就算是 Young 本人也不認為只談論述是一個正確的批判路線）。不過，若是用來解釋為何當今後殖民文化研究中充滿了這麼多論述的傅柯，則似乎略嫌不足了。

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如 Arif Dirlik 在一篇論文中所提到的：後殖民研究是一種文化主義(culturalism) (Dirlik 1994: 346)。他不客氣地

指出，後殖民文化研究輕忽了現代世界的資本主義結構，以致於「後殖民這個字與其說是對任何事物的描述，不如說是一個論述，一個試圖依照那些自認是後殖民知識份子之自我形象來建構世界的論述」(Dirlik 1994: 331)。Dirlik 筆下的資本主義，在本文中我們將以「不同的傅柯」來取代。與 Dirlik 一樣，本文旨在討論後殖民文化研究中的理論偏好，以及這種「偏好」將導致本身理論的侷限性，更嚴重地，將導致其它談法無法出現。

讓我們回到 Young 的文章。儘管 Young 的 'Foucault in Tunisia' 在理論上毫無突破，不過，有兩點倒是值得一提的。首先，在該文中，他對薩伊德在《東方主義》的「錯誤」做了更詳細、更令人信服的批判。他明確地指出，薩伊德對論述的看法其實並不符合傅柯的原意 (Young 2001: 399)；除此之外，Young 還指出，薩伊德未針對論述的物質經驗作分析，也違背了傅柯對論述實踐所下的定義 (Young 2001: 400)。爲了說明薩伊德所理解的「論述」並不是傅柯本人的「論述」，Young 在該文中不只談傅柯在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的論述觀，他還花了大量的篇幅非常詳細地處理了傅柯在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中對論述所做的說明。他引用了傅柯的一段話來說明「傅柯對論述的看法幾乎是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所說的相反」(Young 2001: 405)。

我們所面對處理的是許多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事件，它們是位於獨特的歷史網絡之中。聲明同質性(enunciative homogeneity)的建立絕不意味著在未來數十年或數百年間，人類會說同樣的事、想同樣的事；它也不意味著只要我們確定幾個（有形或無形的）原則之後，其它的事便如必然的結果般隨之到來。(Foucault 1972: 146)

我同意 Young 對薩伊德的批判。但我想強調的是，不管 Young 怎麼批判，他始終是在薩伊德所設下的框框裡在談問題。也就是說，他並不

覺得把殖民主義當成一種論述有什麼不妥，他要論證的是，傅柯所謂的論述其實不是薩伊德所說的那個，而是這個。在我看來，不管是這個或那個，若是拿來當成殖民主義的全部都是不對的。

事實上，在文章的最後，Young 的確也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也是我認為在這篇文章中第二個值得一談的東西。在該文的結論部分，Young 為我們勾勒出一個他心目中所謂傅柯式的殖民論述(Foucauldian model of colonial discourse)應該是什麼樣子。這部分的討論，我個人覺得，乃是他全篇文章寫得最好的一部份。如果之前對薩伊德的嚴厲批判是他對後殖民主義理論的「破」，那麼 Young 在這裡的論證便是他「立」的部分。這個「立」的部份，據我的觀察，是他以前所沒有的。Young 以下的這段話不只點出了當前後殖民論述的困境所在，同時更重要地，點出了一條走出這個困境的出路。有鑑於它的重要性，我盡可能地把它的全文翻譯出來：

殖民論述的分析將不再壓倒性地把殖民主義當成是一個知識與再現的結構；它也不再把那些只要是與殖民主義扯上一點邊的東西拿來做文本的分析。事實上，從傅柯的觀點來看，那些所謂的「殖民論述分析」奇怪的地方就在於，它把論述本身當成是一個主要的分析對象，而不把論述當成是分析某個特殊實踐行動（我們這裡指的是殖民主義）的工具。當然，我們有可能根據殖民主義的論述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來分析殖民主義，不過，它之所以有可能的前提是，我們把殖民主義當成是一個歷史實踐的論述領域。這個殖民主義裡包含了許多政治活動與組織，從這些政治活動及組織中它們發展出各自的知識形式來作為宰制與剝削活動的一部份。……像這樣子的一個殖民論述將不再包含文本本身的分析，而是由殖民主義作為一個侵佔與管理的物質形式之論述實踐所構成。(Young 2001: 408)

無疑地，光是「殖民論述的分析將不再壓倒性地把殖民主義當成是一個知識與再現的結構」這句話對薩伊德的追隨者來說就是一個當頭棒喝。除此之外，Young 還呼籲研究殖民論述的人應該少談一點文化及文學上的文本（不要忘了，他是牛津大學的文學教授），而應該多談一點機構。比如說，他舉了英國的例子，他認為我們應該去看看殖民局(Colonial Office)、印度局(India Office)、國會、媒體、公司行號、教育機構、宗教組織、帝國會議等等。同時，在殖民地中，我們也應該看看總督府以及整個行政體系、軍事、司法、刑罰、商業、醫療、宗教、教育等機構(Young 2001: 409)。這些機構中所「生產」的論述也許沒有文學大師的文采，但這些法令、合約、意見書、調查報告、統計圖表、監視紀錄卻可能比文化或文學領域的論述更能讓人們看出殖民主義的本質（或者應該說的保守一點，可能會讓人們看出殖民主義的另外一個面向）。正如我之前所講的，這是「作為一個管理體系的殖民」與「作為一個再現體系的殖民」之間的差別。若是太強調後者而忽略了前者，那麼結果便是如 John Comaroff and Jean Comaroff 夫婦所講的：「辯證讓位給對話，政治經濟學讓位給詩意，階級衝突讓位給消費，槍的暴力讓位給文本的侵犯，世界歷史的物質過程讓位給符號與風格的本土鬥爭」(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7: 15)。

總之，在 'Foucault in Tunisia' 這篇文章的結論部分，Young 「終於」寫出了一些自 1990 年來他一直沒有寫出來的東西：實踐、管理、剝削、物質形式等等。這不只對 Young 個人來說是一個突破，對那一整群自 1978 年以來便埋首於薩伊德式的殖民論述分析者也是一個突破。「另一個傅柯」終於被這些人發現了，儘管 Young 沒有正面談到殖民權力中的規訓色彩。不過，一個文學評論者肯從文本的迷宮走出來，注視那些在社會機構、組織裡所發生運作的權力，這也許象徵了那個長久以來作為「文化研究」的後殖民主義已經面臨瓶頸，它迫切地需要一些政治社會學的研究來把殖民主義與文本間的巨大空白填滿。

然而，以上這些對 Young 的正面評價並不代表我將全盤接受他的

看法。事實上，對於他所說的「傅柯式的殖民論述」，我還是採取一種較保留的態度。基本上，我們同意 Young 所說的，應該用一種更嚴謹的態度來使用傅柯的概念，這是任何一個理論工作所不能逃避的責任。同時，我也同意 Young 所提倡的關於殖民論述的研究焦點的轉移。不過，我想提出一個更大膽的想法：爲什麼堅持要繼續留在殖民論述中的框框裡打轉？爲什麼不乾脆從論述這個概念中走出來？David Scott 曾說過，後殖民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面臨了一個關卡。也就是說，「它已經變成一個『規範式』的論述空間：它被規範化(normalized)了。那些生產答案的理論機制被人不加思考地迅速接受並應用，這種情形已經嚴重到只要告知遊戲，人們便可以事先預期論證的走向」(Scott 1999: 8)。我們想問，如果論述的空間真的如 Scott 所言是被規範化了，如果爲了要去規範化(de-normalization)，論述這個概念需要加入這麼多的東西（殖民局、印度局、國會、媒體、公司行號、教育機構、宗教組織、帝國會議、總督府、軍事、司法、刑罰、商業、醫療、宗教、教育等機構）才能忠於傅柯的「原味」，那麼是不是有什麼其它的方法或概念可以更準確地抓住 Young 所欲研究的東西呢？

事實上，我們不需訴諸他人，在傅柯的思想裡，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含括 Young 所說的「傅柯式的論述分析」的概念，同時，這種概念也不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誤解。這個概念叫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當然，關於治理性是什麼至今仍是處於衆說紛紜的狀態，連傅柯本人在 1984 年過世之前也一直在「更改」它的定義（見 Rose 1999: 23）。在這裡，我不奢望能爲治理性找到一個全新的、衆人皆能接受的定義。我採取的寫作方式是如 Nikolas Rose 與 Peter Miller 所揭示的，直接詢問治理性分析的對象是什麼。在 Rose 與 Miller 合寫的論文 '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中，Rose 與 Miller 指出，治理性是對治理行爲的分析，它應包括兩個主要的對象：政治理性和統治技藝。前者指的是：「變動的論述領域（權力的行使在這些領域裡被概念化）、道德上的合理化（不同的權威合理化它們各自獨特的行使權力的方法）、適當形式、政治的對象及界線等等……」（Rose and Mil-

ler 1992: 175)。後者指的是：「一整套複雜的計畫、計算、技巧、機構、文件、程序，經由它們權威者試圖來實現並使它們的政治野心生效」(Rose and Miller 1992: 175)。

現在，讓我們比較一下 Young 所說的「傅柯式的論述分析」與 Rose 及 Miller 對治理性的闡述。難道那個「把殖民主義當成是一個歷史實踐的論述領域」不正是 Rose 所說的政治理性嗎？難道殖民局、印度局、國會、媒體、公司行號、教育機構、宗教組織、帝國會議、總督府、軍事、司法、刑罰、商業、醫療、宗教、教育這些機構的運作不正是 Rose 所指認的統治技藝嗎？如果上述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麼也許後殖民文化研究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如 Young 所說的「殖民論述分析焦點上的轉移」，而是殖民分析本身其觀念及出發點上的轉移，也就是：從殖民論述邁向殖民權力分析以及殖民治理性。

## 四、結論

本文企圖處理了一個即使在西方學術圈至今仍沒有被滿意回答的問題：傅柯本人對殖民主義的看法。在第一部份，我藉著一份連署書來點出我的問題：傅柯對於殖民主義真的是沈默嗎？接下來在第二部分我用一種看起來有點「笨拙」的方式把所有傅柯書寫及談話中出現殖民主義及相關字眼的場合一一列出來。我對這些文字進行了一些簡單的分類，也作了些相關的探討，我「暫時」得到的結論是，在殖民主義的議題上，有某些東西「阻止」他發表意見或作深入研究。這個東西，很弔詭地，可能就是他那廣為流傳的權力觀。在第三部分，我藉著批判 Young 在傅柯與殖民主義所做的闡述，一方面來點出他個人對這個議題處理上的偏頗，另一方面也用來點出當前執著於論述分析的后殖民文化研究所遭遇的問題。然後，我用簡短的篇幅提到一個轉移的可能性，這個轉移不是要把文化或文學的殖民論述排除在外，而是用一個更大的架構及視野把殖民論述包含進來。在殖民權力與治理

性的分析中，論述將不再是抽離式的文本分析，而是立基於實際的歷史情境之中，同時，更重要地，它是與一系列複雜的統治技藝有關（這一點是傅柯一直強調的，只不過眾人很奇怪地常常忘記罷了）。也就是說，「作為一種管理體系的殖民」與「作為一種再現體系的殖民」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相指涉的，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後者是前者所使用的策略之一，正是因為這個策略在過去是如此成功，「作為一種管理體系的殖民」才在目前的後殖民文化研究中隱而不彰。我將針對如何研究「作為一種管理體系的殖民」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分析。

最後，我想再強調一次，我絕不宣稱我所列出的二十七個場合便是全部。我非常肯定一定會有一些「漏網之魚」「躲」過我的搜尋，或隱藏在我至今仍未發現的地方。某種程度上來說，我非常期待這些漏網之魚早日出現，它們的出現也許會徹底修正我今日所做的初步探訪及推論。不過，有一個規則我非常確定就算再多的漏網之魚出現也不會被顛覆。這個規則就是：只會有越來越多的傅柯，而不會有一個一致的傅柯。

誌謝：本文初稿發表在文化研究學會2002年會「重返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會議上。感謝本刊評審們的批評意見，雖然爭論的過程相當漫長及慘烈，不過我個人在這整個過程中獲益良多。感謝清華社會所李丁讚教授、宋文里教授、吳介民副教授在百忙之中抽空閱讀本文並對本文提供寶貴的意見。感謝曾熾芬教授的關心及催促，讓這篇論文得以早日完成。最後，感謝研究助理馮瓊瑩在最後定稿階段的大力協助，以及《台灣社會學》謝麗玲的耐心編輯。

## 參考文獻

- 米歇爾 福柯 (1999) 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3) 不正常的人。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姚人多 (2002) 傅柯的工具箱：權力篇。當代 177: 70-83。
- 黃昭堂 (1993) 台灣總督府。黃英哲譯，台北：前衛出版社。
- Bauman, Zygmunt (1998)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hatterjee, Partha (1993) *National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omaroff, John and Jean Comaroff (1997)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Volume II,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on a South 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rif (1994)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20: 328-357.
- Duignan, Peter and Gann, Lewis (1972) *The Rulers of German Africa, 1884-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non, Frantz (1965 [1990])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70 [1974])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Lane.
- (1979a) Governmentality.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6: 5-21.
- (1979b)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Lane.
- (1980a) Georges Canguilhem: Philosopher of Error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7: 51-62.
- (1980b) *Power/Knowledge*. Colin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1 [1979]) Is It Useless to Revolt?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8: 1-8.
- (1982) Subject and Power Pp.208-226 in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ited by Paul Rabinow and Hubert Dreyfu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88a) The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Individuals. Pp. , i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edited by Luther Martin et al..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1988b)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 1977-1984*. Lawrence Kritzman (ed.). London: Routledge.
- (1991) *Remarks on Marx*. New York: Semiotext(e).
- Hacking, Ian (1990)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rasawa, Fuyuki (1999) The Exotic Effect: Foucault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Alte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2): 147-165.
- Macey, David (1993)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London; Hutchinson.
- McClintock, Ann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New York: Routledge.
- Memmi, Albert (1990 [1965])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 Miller, James (1993)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Anchor Books.
- Mitchell, Timothy (1988)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se, Nikolas and Miller, Peter (1992) 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3(2): 173-205.
- Rose, Nikolas (1999)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1978 [1985]) *Orientalism: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i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8)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Pp.1-11 in *After Foucault: Humanistic Knowledge, Postmodern Challenge*, edited by Jonathan Arac.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David (1999) *Refashioning Futures: Criticism after Postcolonial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Pp. 271-313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London: Macmillan.
- Stoler, Ann Laura (1995) *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Robert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1995) Foucault on Race and Colonialism. *New Formations* 25: 57-65.
- (2001) *Postcolonialism*. Oxford: Blackwell.